



大会

正式记录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

第一四四四 次会议逐字记录
1995年7月11日,星期二,下午3时举行
纽约

执行主席:班古拉先生 (塞拉利昂)

下午3时40分开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对我在上次会议结束时发出的呼吁没有得到积极响应表示遗憾。会议不是象我希望的那样在3时开始,而几乎推迟了45分钟。这将对我们的审议工作产生不利影响,我只能希望这种延误不再发生。

我谨特别再次吁请请愿者遵守15分钟的时间限制。

听证请求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提请各位成员注意,又有更多的关于东帝汶和美属维尔京群岛的听证请求,这些请求已在备忘录 5/95/Add.3和14/95中分发。

我们首先处理关于东帝汶问题的听证请求。如果有人反对,我是否可以认为委员会决定同意这些请求?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接下来处理关于美属维尔京群岛的听证请求。如果没有人反对,我是否可以认为委员会决定同意这项请求。

就这样决定。

东帝汶问题(A/AC.109/2026)(续)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现继续关于东帝汶问题的听证。

应主席邀请,马克斯·瑟哈丁纳塔先生(东帝汶宗教传播会)在委员会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瑟哈丁纳塔先生发言。

瑟哈丁纳塔先生(东帝汶宗教传播会)(以英语发言):我是马克斯·瑟哈丁纳塔牧师,是纽约弗农山弗农小高地公理会教会牧师,一名社会工作者和美国东帝汶宗教传播会东北部协调员。

我现在提出的证词是东帝汶宗教传播会全国协调员、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第一圣约翰联合卫理公会的约翰·钱伯林牧师撰写的。

东帝汶的非殖化问题再次摆在委员会面前。1974年4月推翻里斯本军事独裁统治(通常被称为石竹花革命)标志着开始结束葡萄牙对东帝汶的殖民统治。随后,东帝汶各政党立即与新的葡萄牙地方行政当局合作,开始了非殖化进程。然而印度尼西亚为兼并东帝汶而进行的情报活

动挑动了一场短暂的内战，破坏了非殖化进程。1975年9月内战刚一停止，印度尼西亚军队就开始军事入侵东帝汶，1975年12月7日入侵行动达到高潮，对这个领土展开全面攻击。

差不多20年后，在印度尼西亚持续占领的情况下，根据国际法葡萄牙仍是东帝汶的管理国，因为该领土从未经过正式的非殖化过程。但是每年这个时候，委员会不是收到东帝汶非殖化的报告，而是听到关于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残暴地迫使该领土重新殖民化的陈述。

东帝汶宗教传播会愿将其证词加进委员会今天的记录中。东帝汶宗教传播会是美利坚合众国境内的一个牧师和非宗教人士联合会，是为了帮助东帝汶人民在他们饱受苦难的国家实现公正的和平，实现符合《联合国宪章》以及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有关决议的真正自治。

1994年10日，我以东帝汶宗教传播会协调员的身份前往东帝汶进行事实调查。虽然我是进行教会访问，但我一人独行，并用旅游者签证入境，因为我想尽可能不引起印度尼西亚军事当局的注意。

尽管几年来我一直致力于东帝汶问题，但我对前往该地的任何访问者遇到的人身、心理和精神方面的现实毫无准备。我曾在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的军事镇压达到高潮时去过这些国家，但我从未体会到我在东帝汶感到的那种害怕的恐惧。

访问东帝汶的人必须准备好被跟踪，并且预料到他们的所有行动都会受到监视。同我交谈的东帝汶年轻人告诉我，他们完全可能几乎在刚同我谈过话后就被抓起来，遭到逮捕、审讯和殴打。许多人尽管知道这一点，仍愿冒着极大的危险同我交谈。我听到许多第一手的叙述，讲述了被怀疑有赞成独立倾向和/或试图将违反人权情况传到外界的学生和其他人受到的折磨。

在非正式交谈中很少提到个人姓名。哪怕是最无恶意的谈话如果被偷听或被误解，都可能导致某人被杀害。日常生活显示出持续的紧张和恐惧。法外处决、有计划地强奸东帝汶妇女以及强制节育的现象比比皆是。

“我走访了帝力和其他地方的一些宗教领袖。每到一地点，我被迫向地方当局登记，并报告我的居住地点。出于这一原因，我选择不公开报道我所进行的任何谈话的细节。

“但是，我现在毫无疑问地知道，印度尼西亚政府所谓绝大多数东帝汶人赞成与印度尼西亚‘合并’的说法是玩世不恭的宣传。印度尼西亚政府怎么可能令人相信地声称了解东帝汶人的真实感情？在东帝汶，只有那些表明忠于印度尼西亚政策的人才有言论和集会的基本自由。印度尼西亚的监狱中关押着太多因提出不同的政治主张的非暴力行动而坐牢的东帝汶人。事实上，如果印度尼西亚当局对他们自己的宣传的正确性有信心，他们应该高兴地接受联合国的要求，在前葡萄牙殖民地组织一次由国际监督的自决行动。

“去年11月，在雅加达举行亚太经济合作理事会会议期间，东帝汶青年对印度尼西亚的统治的不满引起世界很大的注意。但是，东帝汶的宗教领袖们也表示了严重关切。东帝汶宗教联系组织的代表们已经同帝力教区牧师兼东帝汶罗马天主教教会名义领导人罗马天主教卡洛斯·希梅内斯贝洛主教和东帝汶新教教会领袖阿林多·马萨尔牧师进行了协商。贝洛主教继续揭露东帝汶境粗暴侵犯人权的状况，要求军队完全撤走，并在前葡萄牙殖民地举行一次由国际监督的关于自决问题的公民表决。马萨尔牧师采取了类似的立场，他说：

‘合并只有作为实行东帝汶人民自决权利的结果才能被接受。应该让东帝汶人有机会自己决定他们是否想要并入印度尼西亚。’

“东帝汶领袖们所表达的关注也反映了美国各宗教团体中对东帝汶问题的认识日益提高。地区和国家一级的各教派正在拟订立场性文件、决议和建议，支持东帝汶人自决。美国教会全国理事会当选主席梅尔文·塔尔伯特主教已经一再呼吁结束印度尼西亚对东帝汶的占领。塔尔伯特主教在北加利福尼亚主教特别会议刊物《红杉》上写文章指出：

‘我们必须说服印度尼西亚政府结束它对东帝汶的占领，正如我们曾经说服南非政府结束种族隔离一样。’

“1989年2月，贝洛主教请当时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支持和便利东帝汶非殖民化，以及举行由联合国主办的关于自决问题公民投票。贝洛主教在给秘书长的信中说：

‘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个人民，我们正在死亡’。

与雅加达所声称的恰恰相反，东帝汶境内的局势并无改善。贝洛主教最近声明：

‘局势和过去一样糟糕……我们生活在一片焦土上。’

现在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必须听取贝洛主教寻求正义的呼吁。

“联合国成立五十年之后，东帝汶继续遭受占领是这一世界机构历史上的一个不幸和悲惨的污点。我们以国际法的名义、以人权和基本人格的名义，促请本委员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和适当的手段结束印度尼西亚政府对东帝汶的重新殖民化，让东帝汶人行使他们的自决权利。”

以上是圣约翰第一联合循道会的张伯伦牧师的证词。我仅简单地补充几句，并谈些个人的看法。

我是一名印度尼西亚裔美国人。我的父亲是一个印度尼西亚牧师，他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印度尼西亚被日本占领军囚禁随后处决。我的继父是一个已经退休的印度尼西亚议会议员，他曾在1966年至1971年担任议员。我早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接受初期教育，我自豪和愉快地记得1945年宣布印度尼西亚独立。1949年，我高兴地看到印度尼西亚正式从殖民附属变为一个主权国家。我继续对我的祖国有着强烈的感情。

然而，在过去20年中，我极为痛心和悲伤地看到印度尼西亚这样一个自己经历了长期渴望自决，随后尝到了自由和独立的国家政府，占领东帝汶并且重新使它成为殖民地。自从1991年11月12日圣罗斯大屠杀以来——当时印度尼西亚士兵开枪残酷射杀前往参加葬礼的无辜者，我的两个美国朋友也在这一事件中成为无辜受害者——我已经成为每年11月在这些建筑马路对面的联合国教会中心为东帝汶人民举行的各宗教团体悼念和祈祷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

我同无数的印度尼西亚裔美国人和其他许多留在印度尼西亚的印度尼西亚人保持接触。我可以向各位保证，越来越多的印度尼西亚人也有我所表达的同样的情感。生活在印度尼西亚境内的人如果公开表达这样的意见，就有受迫害和逮捕的危险，生活在美国的印度尼西亚人，甚至也是美国公民的印度尼西亚人，也经常不无理由担心，如果他们公开表示反对印度尼西亚对东帝汶的可耻和非法的占领，他们将不能返回印度尼西亚探亲。

特别委员会结束对东帝汶的重新殖民化和确保这一受苦受难的民族行使真正自决的努力，将得到东帝汶人的赞扬，这些努力也将受到印度尼西亚人的欢迎。

苏亚迪纳塔先生退席。

应主席邀请，迈克尔·伊德先生(澳大利亚支持自由东帝汶联盟)在请愿者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伊德先生发言。

伊德先生(澳大利亚支持自由东帝汶联盟)(以英语发言)：澳大利亚支持自由东帝汶联盟欢迎有此机会向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阐述它所关注的问题。我们深感不安的是，在国际仔细审查印度尼西亚政府对东帝汶的非法入侵和占领20年之后，东帝汶人民仍未行使他们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

我们也高兴地看到，尽管已经过了20年，国际社会仍在积极处理东帝汶局势。而且，国际社会正越来越意识到印度尼西亚对东帝汶的统治的傲慢的野蛮性。东帝汶人拒绝接受把他们强迫并入印度尼西亚，拒绝默默地忍受，

这是不能否认的。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我们相信东帝汶人也同样感到欣慰是，国际社会并没有抛弃他们。我们感到非常鼓舞的是，这一问题今天正在联合国得到讨论。

澳大利亚自由东帝汶联盟是澳大利亚的一个组织网络，其创立的目的是要在可能的情况下支持东帝汶人的自决权利。这些组织从澳大利亚社会的广泛阶层吸收成员，其中包括学者、工会代表、大多数宗教教派的成员以及人道主义救援组织和各政党的成员。

由于澳大利亚历届政府未能对东帝汶人推行一项道德或正义的政策，澳大利亚自由东帝汶联盟的各组织为普通澳大利亚人提供了一个手段，使东帝汶人和国际社会知识很多澳大利亚人不同意澳大利亚在该问题上的官方行动。

其中一些组织在印度尼西亚入侵以前就已存在，并在到目前为止的这些岁月中发挥了其作为从东帝汶内部向世界输送信息的作用。我们今天作此介绍，就是借助对东帝汶人命运的长期的了解和关注。

在考虑我们今天如何能够就该问题采取行动时，重要的是我们清楚地了解过去20年中在东帝汶内部实际发生的情况以及现在在那里正在发生的情况。

印度尼西亚对东帝汶的入侵和占领始于1975年12月7日，受到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谴责。东帝汶从未在军事上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威胁过印度尼西亚。实际上，它对于大得多的印度尼西亚从未构成任何形式的威胁。

东帝汶问题的法律层面可能是最无争议的问题。无可否认，印度尼西亚的入侵和占领违反了国际法律的根本准则。首先，占领剥夺了东帝汶的自决权利，其次，军事干涉本身构成侵略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习惯法。

对于自决权的问题，一项重要的参考是《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即第1514(XV)号决议。它承认各非自治领土享有自决权利，其人民有权在完成非殖化进程时决定其地位。

尽管印度尼西亚政府有所宣称，然而这种进程从未在东帝汶出现。印度尼西亚政府于1976年5月在帝力采取的

所谓程序的合法性，一直受到东帝汶参与者的否认。随后数年中的分析表明：1976年当所谓人民议会表决通过与印度尼西亚合并时，大多数东帝汶的人口处于印度尼西亚的控制之外。

更易被人们理解的是现在详细记载的东帝汶人在印度尼西亚军事占领下的痛苦。在四年的占领中，东帝汶人口大幅剧减。东帝汶人说其700 000人口的一半已经死亡，入侵前人口数字与印度尼西亚政府1980年的一次人口普查的比较表明，150 000至200 000的东帝汶人失踪。

据信，在入侵的最初几个月以及随后在1977年末至1979年初进行的印度尼西亚军事围剿中，出现多次对东帝汶人的屠杀。这些年中的一个主要死亡原因是饥饿，因为东帝汶人被赶入战略定居营，并不准获得土地和国际人道主义援助。至1979年中之前，雅加达不允许任何国际援助机构在东帝汶活动。

无论实际死亡人数为何，东帝汶都高居在军事压迫者手中人们大量丧生的国家或领土的名单之上。这一经历深深铭刻在所有东帝汶人的心灵之中。

在1980年以来的岁月中，印度尼西亚政府宣称：其在东帝汶的经济发展计划证实了东帝汶与印度尼西亚的成功合并。然而，该计划并未使东帝汶人民获得任何利益或减轻在东帝汶持续军事统治的影响、该领土上的恐惧气氛或东帝汶人对自决的不灭的愿望。

印度尼西亚的军事统治的真正本性，通过对1991年11月在帝力圣克鲁斯墓地对手无寸铁平民的屠杀的录影而昭示天下。对东帝汶人而言，这只是以前多次发生情况的重演。

酷刑和法外处决的长期历史仍在东帝汶持续。上个月一名印度尼西亚士兵所提供的证据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今年一月，一名高级官员命令他即决处决被军队关压在利基萨的6名东帝汶平民。

近年，记者和普通公民无法访问东帝汶。几乎所有人都发回关于愤怒和惊恐的民众、压迫性质的印度尼西亚军事存在以及似乎不可摧毁的自由愿望的报告。

澳大利亚全国教会理事会总干事戴维·吉尔牧师于3月走访了东帝汶,描述了其人民感受到的一种深刻的疏远感。东帝汶人告诉他一切都没有改变。大规模军事存在、频繁侵犯人权的情况以及安全人员的监测仍然存在。甚至因把1991年帝力屠杀描述为“偏差”而在澳大利亚令人记忆犹深的我国外长,今年5月把印度尼西亚在东帝汶的军事存在描述为具有压迫性,并承认在改善人权方面进展甚微。

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巴克雷·瓦利·恩迪亚耶先生在其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断定使1991年在帝力屠杀东帝汶人事件得已发生的条件仍然存在(E/CN.4/1559/61/Add.1,第74段)。他说,对虐待行为负有责任的印度尼西亚保安部队的成员并未受到追纠,实际上继续不受惩罚(同上,第74段)。

换言之,在印度尼西亚军事占领20年中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因此,对我们所有人提出的问题是“能够作什么呢?”

有一些可喜的迹象。首先是在政府和非政府一级日益提高的国际意识,认识到对东帝汶人民所一直并正在犯下的粗暴的非正义罪行,以及这种情况需要得到解决。我们高兴地注意到,过去一直是印度尼西亚在东帝汶统治的主要外交支持者的美国,现已提高其批评印度尼西亚在东帝汶行为的级别。在印度尼西亚内部,已在非政府阶层出现了一种批评印度尼西亚政府对东帝汶的政策意见。

印度尼西亚自己于1991年和今年确定正式调查在东帝汶发生的军事屠杀,这意味着雅加达现在正注意到国际上的严重关切。印度尼西亚外长阿里·阿拉塔斯先生曾把东帝汶描述为是印度尼西亚“鞋里的一块碎石”。我国外长加里恩·埃文斯从此把东帝汶问题描述为印度尼西亚在国际舞台上的“拦路石”。

所以,现在正是保持和加强对东帝汶人自决权利的国际支持尤其是多方支持的时候,而不是放弃的时候。

印度尼西亚或许大可将最近对屠杀的调查指为其公正对待这些在东帝汶出现的事件的证明。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对1991年帝力大屠杀的调查,清楚地表明了印度尼

西的调查是如何有限和虚假。需要施加国际压力来确保这种调查是真实的。

国际上关于印度尼西亚需要大幅减少其在东帝汶的军事存在并给予该领土某种形式的自治的讨论日益增多,并且有迹象表明,印度尼西亚政府的一些部门接受这种设想。削减部队将是可喜的,但我们认为部队根本就不应在那里。正如联合国早些时候的决议所表明的那样,它们从一开始就无权在那里。显然,没有国际上的持续压力,印度尼西亚就不会削减部队。就特别自治而言,如果雅加达一旦表明愿意给予某种形式的自治,则印度尼西亚在东帝汶统治的悲惨历史显示出有必要实行国际监督。我们仍然认为,这种步骤不应被看作是对东帝汶自决权利的取代。

我们同样关注的是,印度尼西亚的移民计划将继续使东帝汶人在经济和政治上处于边缘地位。他们会在自己的领土上成为少数民族。任何有关自治的建议都需要包括停止这种移民。

在1975年至1982年这段期间,在大会中对东帝汶自决权的“赞成”投票逐渐减少,东帝汶人现在需要的是对在这段期间把其投票改为“反对”或“弃权”的政府的政策进行审查。

鉴于最近所有的证据显示东帝汶人的困境和愿望20年来仍未改变,我们恳请这些国家重新考虑其立场。我们认为,前些年在“冷战”气氛中的集团表决给一些国家不得不进行表决的方式带来不应有和不幸的影响。无论各国政府改变其“赞成”投票的原因如何,无论它们是政治或经济的原因,后果是明显的。这种投票的改变使东帝汶的占领部队获得信心,使东帝汶人处于遭受任意逮捕、酷刑和一系列其他基本人权受到侵犯的命运。

我国政府在法律上承认东帝汶与印度尼西亚合并,这促使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达成协议,开发东帝汶与澳大利亚北部海岸之间的石油藏量,但没有给东帝汶人民带来任何好处。这种承认没有得到澳大利亚人民的支持,并且损害了政府处理东帝汶人权问题的方法的可信度。我国政府承认东帝汶与印度尼西亚合并,这使我国政府无法真正支持东帝汶人民行使自决的神圣权利。

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很少国家政府跟着走这条显然不公正的道路。令人遗憾的东帝汶局势已经存在太久。作为国际社会,现在已经是你们下定决心、制止东帝汶这种可怕局面的时候了。有人要求我们要有耐心。但是早就应该进行改革,现在应该只争朝夕。东帝汶不应该再经历另一个20年的孤立和压迫。够了!

东帝汶人民已经表示,他们将不接受强加于他们的合并。他们有这项权利。印度尼西亚没有权利压制东帝汶人民的愿望。国际社会必须通过象这样的论坛表明这一点。冷战已经结束,现在应该抛弃集团表决方式,重新确立最基本的国际原则。现在已经不是左翼或右翼政治问题——而是对与错的问题。这是一个尊严与良心的问题。

问题现在就在委员会的手中。为东帝汶人民申张正义是可能的。

伊德先生退席。

应主席邀请,文斯·科米斯基先生(天主教国际关系研究所)在委员会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文斯·科米斯基先生发言。

科米斯基先生(天主教国际关系研究所(国关研究所))(以英语发言):天主教国际关系研究所感谢特别委员会让我们今天有机会就东帝汶问题发言,我们对这个问题已经关注多年。

上个月在奥地利的施莱宁举行了东帝汶内部对话,在这次对话中,卡洛斯·西蒙斯·贝洛主教提出了一份论文,论述了有关东帝汶教会的若干基本问题以及他关于改革前景的反思。贝洛主教是作为一个“一向紧密联系人民”的教会代表发言的。他明确指出,在东帝汶人民获得自由,而不是被当作被征服的臣民对待之前,东帝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国关研究所在今天向委员会提交的请愿书中尽力将东帝汶人民在过去一年日常生活的现实与主教在上述发言中所列的基本需要进行比较。

第一点是,只有同时尊重基本权利,只有让人民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物质发展才能够被视为发展。

一年来,许多东帝汶人在经过不公正的审判之后,被判数年至无期徒刑,许多人仅仅是因为从事和平的支持独立活动。我们要特别提到何塞·安东尼奥·内维斯,他由于努力促使国际社会注意在东帝汶发生的侵犯人权现象,被判四年徒刑。还有其他人被监禁,因为他们进行和平示威,支持独立。一年来,在重要的周年纪念日,例如去年的11月12日,以及诸如亚太经社会合作会议等重要的国际会议期间,在印度尼西亚各城市和在东帝汶本土,数百名东帝汶人遭到任意逮捕、拘禁、甚至严刑拷打。

我们要提到,今年1月12日,在利基萨,6名东帝汶平民被非法杀害。我们承认,印度尼西亚当局在其调查过程中,以及在国际人权委员会的调查过程中,已经采取步骤,承认所发生的事情显然侵犯人权,并已采取步骤惩罚肇事者,但这个事件仍然是司空见惯的暴行中的一例。

一年来,我们从东帝汶所收到的报告无一例外地指出:在东帝汶仍然没有言论自由;主要由于驻军,气氛非常压抑;许多东帝汶人的基本人权得不到尊重。我们不得不提到1994年12月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关于非法、草率或任意杀人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

“大幅度裁减东帝汶驻军是建立信托措施的前提条件,这可以使每个家庭感到安全,从而报告他们下落不明或被杀害的亲属”。(E/CN.4/1995/61/Add.1,第83段)

第二个问题是,东帝汶人民感到他们没有得到尊重,而是感到被征服。

今年年初从东帝汶送出的一份未署名报告叙述了“忍者”帮派的活动,这些帮派在军事当局的唆使下对帝力和巴克乌居民进行白色恐怖。据作者指出,今年一月,东部的军事行动已经加强,在东部的蒂巴、马比亚和赫拉梅蒂纳罗已经实行身份证制度,以防止村民前往帝力。

“任何想进城的人,都被迫脱下衣服。任何没有身份证的人都被逮捕和遭到酷刑。这种管制只适应于东帝汶人。”

当地人民仍然没有行动自由,并且以这种基本方式被羞辱,因此他们感到没有受到尊重,反而感到他们是一个被征服的民族,这一点也不奇怪。

第三点是,年轻人没有机会。

贝洛主教特别关注青年人,在最近的采访、通信和演讲中,他对东帝汶人缺乏机会这个问题感到惊愕,因为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岛屿的移民得到最好的工作。仅仅进行教育不足以解决问题。往往正是青年人和学生遭到印度尼西亚军队的任意逮捕和拘禁。我们呼吁印度尼西亚当局采取严肃的措施,解决这个根本性的不公正现象。

第四点是,尊重文化、宗教和历史,在东帝汶进行的20年印度尼西亚化,已经开始威胁到东帝汶的特征。有人已经试图禁止前殖民国的语言葡萄牙语,甚至禁止使用他们自己的当地语言。陌生的生活方式和语言被强加在他们头上,许多东帝汶人感到他们的历史正在被一个新的殖民大国篡改。一年多来,教会人员多次遭到攻击,印度尼西亚士兵在作弥撒时亵渎圣体,这更加重了这种感觉。这促使东帝汶人民愤怒地、往往是强烈地反抗,这反过来导致军事当局更加强地进行镇压。这是一个危险的恶性循环,只要增强接受该国文化差异以及宗教传统的意愿,就可能解决这个循环。

第五点是,教会有不受任何人操纵进行活动的自由,教会一直是面对往往非常严重的压力在这种状况下活动的。在这段时期内,海关研究所收到的报告指出,军队仍然在干涉教会的生活和活动。关于对神父和神职人员进行造谣和诬陷的报道时有所闻,其目的是破坏东帝汶当地神职人员的形象。一小部分人受到皈依伊斯兰教的压力,这挑起宗教内部的紧张关系,制造了东帝汶冲突是宗教冲突的假象。贝洛主教亲自一再戳穿这种假象。

我下面讨论第六点,全面发展的问題。考虑到基本道德秩序。没人会否认,由于印度尼西亚过去20年的占领,东帝汶的基础设施有所发展。但是物质发展没有赢得东帝汶人的心。相反,经验证明暴力状况继续存在。在东帝汶人民感到他们首先和最重要地作为东帝汶人得到全面尊重之前,包括对其文化、民族特性和宗教的尊重,没有集体发展经验可谈。

在联合国五十周年之际,本委员会主席已表示特别委员会愿意实现其使世界在没有殖民主义的情况下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目标。在印度尼西亚今年庆祝独立50周年时,让我们大家努力使这一目标也在东帝汶成为现实。

请愿者退席。

应主席邀请,安德鲁·克拉彭先生(大赦国际)在请愿者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克拉彭先生发言。

克拉彭先生(大赦国际)(以英语发言):印度尼西亚统治了东帝汶20年。在这段时间内,有进行支持独立活动嫌疑的东帝汶人的权利遭到有系统的侵犯。大赦国际感到遗憾的是,我们不得不在今天的发言中再次提请联合国会员国注意东帝汶境内一系列违反人权的行为。鉴于印度尼西亚政府继续压制东帝汶人的基本权利,大赦国际借此机会描述这些违反现象并且提出建议,一旦得到执行,这些建议将改善东帝汶的人权局势。

1994年11月以及今年整个1月和2月的两个主要动乱时期造成大规模任意逮捕、酷刑和拷打以及几十次包括对良心犯的政治审判。当局继续使用所有这些侵权做法,在东帝汶压制甚至和平的不同意见。虽然国际注意力迫使印度尼西亚政府对今年1月份六个平民的屠杀案进行调查,其它报道的谋杀和“失踪”没有占据国际社会的想象力并且因此仍未解决。和过去几年一样,国际社会再次没有对印度尼西亚政府施加改善人权的充分压力。虽然联合国机制本身对印度尼西亚进行了某些最强烈的批评,这种批评没有在整个联合国中得到一贯的支持。

印度尼西亚政府在1994年6月出版了一个题为“澄清东帝汶真相”的小册子。这本书企图解决关于印度尼西亚对东帝汶统治的某些“神话”。该书一开头有以下一段话:

“这个神话说印度尼西亚政府从事了各种可怕的暴行,却没有提供法庭可能接受的丝毫证据或证明。编造这一神话是为了使印度尼西亚政府看上去会毫无顾忌地违反自己的法律和基本原则以及甚至其人民根深蒂固的价值。”

令人遗憾的是,大赦国际能够为这些侵权行为提供充分证据。这次发言中提供的所有证据涉及1994年6月以来的侵权行为。在印度尼西亚政府出版这本关于东帝汶小

册子的同时,东帝汶学生积极分子何塞·安东尼奥·内韦斯在玛琅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被军方情报官员审讯。他的罪过是企图向海外递送资料以便消除印度尼西亚政府自己关于东帝汶人权状况改善的一些“神话”。何塞·内韦斯今年2月被判处四年监禁。他是一个政治犯,在不公正的审判之后被宣判有罪,这种审判常常违反印度尼西亚自己的法律。

几个月之后在印度尼西亚举行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时,约125至180东帝汶人在雅加达和帝力发生示威游行之后被强行拘留。他们其中一些人被捕时遭到毒打,其他人在拘留中受到酷刑。27人目前由于他们在示威游行中的作用而面临审判。

在1月,何塞·安东尼奥·贝洛和其他23人在帝力的东帝汶大学和平示威后被捕。何塞被捕的第一个夜里,胳膊和腿被捆起来,头朝下吊在一个军方情报办公室里。当他第二天早上被放下来时遭到用棍子和电线的抽打并且据报道受到电击。东帝汶军方发言人莱顿·辛博伦少校否认何塞有受酷刑危险的报道,他说,

“我们对他们照顾得很好并且向他们提供食物,就是为了让他们告诉我们他们为什么参加游行和谁是他们后台的事实。”

何塞后来被判处18个月的监禁。现在他的名字已经列入大赦国际的不公正审判后被定罪良心犯名单。

印度尼西亚军方在1月13日宣布,六个东帝汶革命阵线游击队员在和军队的军事冲突中被枪杀。我们现在知道,这六个人是没有武装的平民并且是政治屠杀的受害者。两个士兵由于这次屠杀受到监禁的判处,但是负责东帝汶的区域军事指挥官阿当·鲁基阿特纳少将不确定如何会发生这种事情。他说,

“我们必须查清他们为什么做了他们所做的是因为他们已经感到‘饱和了’或因为他们恼怒而不知所措?”

答案不在这里。这些屠杀完全符合缺乏对违反人权现象进行有系统的彻底调查所造成的侵权的格式。这些屠杀

发生在这样一个制度里,一方面它将一名谋杀六个无武装的平民的士兵送到监狱里呆四年半,另一方面判一个良心犯15年徒刑,因为1991年11月他在圣克鲁斯的示威中起了非暴力作用。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主席在1995年3月发表了一份关于东帝汶的声明,敦促印度尼西亚政府继续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合作,给予接触被拘留者的机会。尽管有这种合作,被拘留者继续受到酷刑折磨。在该声明发表了三个星期后,红十字委员会已经探视过的何塞·安东尼奥·贝洛再次遭到拷打。这次他吐血了。恩德里克·贝尔米罗在12月被捕后被军方情报官员打得十分严重,他的头上需要缝七针。朋友们说,在他现在面临判乱罪的审判时,酷刑和拷打却使他神情呆痴和恍惚。这些只是大赦国际收到的有关酷刑报道的两个例子。还有更多的情况。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将在今年年底访问东帝汶。局势的严重性使人们对高级专员的访问抱有很高的期望。大赦国际希望,当高级专员去东帝汶时,他将督促该政府立即执行已经访问过东帝汶的两位联合国专家的建议:他们是关于酷刑的特别报告员和关于法外、即决或任意处决的特别报告员。我们还希望,这次访问将产生具体行动,包括印度尼西亚政府采取措施以调查所有过去侵权行为并且防止今后重犯,并且废除允许拘留政治犯的立法。大赦国际还希望,这次访问将有助于为国际和国内人权监测员和记者获得无限制进入东帝汶的机会铺平道路。

大赦国际希望,高级专员的建议将得到印度尼西亚政府的积极回应,胜过两位特别报告员在访问东帝汶之后所得到的反应。两位特别报告员都提出了具体建议,这些建议会改进东帝汶的人权局势。可悲的是,除关于酷刑的特别报告员的一项建议外--成立一个国家人权委员会--印度尼西亚政府迄今忽视了两位专家的所有其他建议。

大赦国际认为,除非采取三个步骤,否则违法行为将在东帝汶继续存在。这三个步骤是:印度尼西亚政府采取具体行动,处理在东帝汶发生的违法行为的根源,其中包括保安部队不受惩罚、任意滥用职权和允许监禁良心犯的立法;在政策和实践中保证对违法行为的独立监督;无论东帝汶何时发生违法行为,国际社会都一予以谴责。

除非采取这三个步骤,否则东帝汶人将进入其受酷刑、任意拘留、不公正审判、政治监禁和屠杀的第三个十年。

请愿者退席。

应主席邀请,珍妮弗·沃什伯恩女士(支持帝汶行动组织)在委员会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沃什伯恩女士发言。

沃什伯恩女士(支持帝汶行动组织)(以英语发言):我的名字是珍妮弗·沃什伯恩,我这里是代表位于巴黎的支持帝汶行动组织。我们感谢委员会今年再次允许我们为东帝汶人民向其请愿。去年,我们曾向大家报告,显然由于12个组织四个月来的成功运动,在东帝汶自决问题上的大众意识有所提高。我们曾写道,在那场运动后,政府多数派的一位参议员自1986年以来首次就东帝汶被占领土内印度尼西亚暴力镇压问题向法国外交部长提交书面质询。

我们高兴地向大家报告,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大赦国际就印度尼西亚和东帝汶问题发动的非常成功的运动,各国议会在1994和1995年仍在继续觉醒,可以这样说,大赦国际的运动是四个月联合支持东帝汶运动的继续。大赦国际从议员们那里收到了100份答复,其中包括在参议院和国民大会提出的十几项新的书面质询,有些质询反映了对印度尼西亚本土内侵害人权行为的关切。这些质询似乎已促使外交部长在其答复中逐渐更多地强调对人权的关切,更少地强调经济关系。

同时,四个月的运动已导致一个更永久性的体制的产生。1994年10月成立的帝汶论坛是各个旨在为促进东帝汶自决权利而采取行动的组织的集合体。其目前15个成员是:支持帝汶行动组织和ASTO(两个东帝汶声援团体)、亚洲-太平洋组织、ICRA国际和部落行动(三个有关土著人民权利的非政府组织)、Cap Magelan,一个在法国的葡萄牙学生会、Cimade、法国葡萄牙合作组织协调会、劳工联合总会、法国自由、正义与和平组织、人民团结和青年团结网(声援南方人民)、法国发展问题非政府组织论坛/欧洲联盟,和第三世界新闻网。

论坛在去年运动的同一原则下运作。各成员组织都保留它们的特点,并根据其愿望、文化和能力参加各项活动。同ACAT、大赦国际、CCFD、法国和国际人权同盟联合会、MIAP和基督教和平运动等非政府组织也有密切联系,有时还进行合作。

论坛的活动包括游说和更加明显的活动,比如我们今年5月15日至30日组织的演讲团。六名在葡萄牙沦为难民的东帝汶学生来走访法国,提供了在其自己国家所发生情况的第一手见证。其中三名学生就是去年11月在雅加达美国使馆避难的29名学生中的三个。他们每两人一组分三组--在西南、东南和西部/大巴黎地区--进行了三次巡回游行,参加了新闻发布会,接受地方新闻界采访并会晤了政治人物等等。同在采取同一主动行动的其它国家一样,回应虽非常出色,但却十分有限,因为我国媒介对东帝汶局势和问题的存在几乎完全封锁。若干地方非政府组织曾决定把印度尼西亚和东帝汶作为关切问题提出来,并帮助东帝汶人民和印度尼西亚境内支持民主的运动。论坛计划在今后几个月里从事更多的活动,但目前似乎时机还不成熟,不能予以公布。

我们要继续对最近有关东帝汶的国际事态发展发表一些评论,并对联合国在这个问题上的作用提出一些建议。我们欣见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同毛比拉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东帝汶革命阵线(革阵)和帝汶民主联盟(民盟)去年在纽约史无前例的会晤。我们欢迎印度尼西亚接受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今年年底访问该领土。我们欢迎上个月在奥地利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的前所未有的包罗各方东帝汶人的会议。我们欢迎关于需要进一步召开此类会议的报告,葡萄牙和印度尼西亚两国部长在上星期六第六轮会谈期间已就此达成协议。我们赞扬该会议首次处理实质问题,并就维护和促进东帝汶人民的文化特征进行了讨论。

我们欢迎这些事态发展,因为它们使东帝汶人终于可以开始对其自己的命运有发言权。但是,欢迎并不意味着容忍各方在这个问题上的行为。这个问题不是葡萄牙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争端,而是印度尼西亚对东帝汶人民的非法侵略行为,这一点对本委员会来说不是新闻。根本不存在葡萄牙和印度尼西亚作用平衡的问题。葡萄牙利用其管理国职能促进东帝汶自决权是正确的,而印度尼西亚

利用其占领国地位以各种可能的方式阻碍这项权利则是错误的。

各方的态度已经证明了这些观点。我们赞赏秘书长和葡萄牙外交部长在推动这一问题取得进展方面所表现的诚意和决心。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到占领国的顽固态度。正如委员会将从其它请愿和证词中所了解的那样，东帝汶的人权情况没有任何改善。相反，情况正在不断恶化。法外、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关于最近的事态发展，让我仅仅提及显然由军事当局许可的“忍者”帮派卷土重来和一年半前并不存在的宗教挑衅情况的出现。并不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记者和非政府组织包括印度尼西亚的非政府组织都没有任何正常渠道进入该领土。正如国际媒介在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期间所看到的那样，在有不受欢迎的见证者在场时，镇压活动一直保持低姿态，但在国际媒介人员离开后，它就来势汹汹进行报复。占领国假装致力于解决问题，但在可能时却试图破坏该进程。我将仅提及以某种借口推翻原始计划的四月会期，推迟帝汶各派间会议。幸运的是，由于秘书长和葡萄牙的努力，该会议已重新列入议程。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印度尼西亚的积极行动似乎并非产生于真正的诚意，而是迫于它越来越不能抗拒的压力。例如，我们把10月在纽约的会晤视为预见到11月亚太经济合作会议而采取的一个举动。我们把接受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访问视为逃避人权委员会谴责的唯一途径。我们把1月份两名军人因伤害平民被军事法庭判处以印度尼西亚的标准来看较长的刑期视为一些外国施压的直接结果。最后，我们把印度尼西亚应曼蒂里先生在圣克鲁斯大屠杀后所说的话将其从澳大利亚大使职务上召回视为澳大利亚舆论对其政府，结果也对印度尼西亚成功施加压力的结果。

委员会非常清楚，分析这些事态发展的目的是表明，对侵略者施加压力是有收益的，必须设法这样做。在欢迎自圣克鲁斯大屠杀以来自决进程取得显著进展的同时，我们必须表明，这些进展只是同以前的事态发展相比给人以深刻印象。我们希望取得更快的进展，因为领土上的东帝汶人民每天都在为这种缓慢速度付出代价。

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一些挫折。尽管国际法院重申了东帝汶人民的权利，但却仅仅因为印度尼西亚不承认其权威，就认为不宜对帝汶山峡案宣布裁决，我们对此深感遗憾。在一般人看来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理由。不过我们从印度尼西亚不承认国际法院这一事实看到又一个虚弱的迹象。我们向印度尼西亚提出挑战，看它是否敢承认国际法院的权威，以使帝汶山峡案能得到妥善处理。

我们还感到遗憾的是，联合国没有象它应该做的那样行使东帝汶人民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东帝汶人民仍没有参加葡萄牙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会谈，他们甚至被正式阻止在所谓的“包罗万象的”东帝汶内部对话中讨论他们自己领土的地位。我们要求联合国履行其职责，帮助东帝汶人民成为国际上解决这个问题中的一方。

我们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如果联合国能在该领土长期派驻人员，将会大大加快这一进程，现在看来这很有可能。我们请联合国在东帝汶长期派驻人员。

7月18日和19日，由世界银行担任主席的印度尼西亚问题协商小组将在巴黎举行会议，以向印度尼西亚提供公共发展援助。作为联合国机构的世界银行正在帮助向印度尼西亚在被占领的东帝汶领土上的发展项目提供资金，我们对此表示遗憾。这些项目中最臭名昭著的是印度尼西亚的“家庭计划”，它在东帝汶的目的是不可告人的，我们要求联合国让世界银行停止帮助印度尼西亚非法占领东帝汶。

我们重申，我们根本反对印度尼西亚作为委员会的成员参加与东帝汶有关的讨论。我们再次请委员会将印度尼西亚排除在有关东帝汶的任何决策进程之外。

最后，我们提请委员会注意，有50多名东帝汶政治犯被非法拘留，他们经常被关押在东帝汶以外的地方，关押条件通常极差。我们请联合国采取行动，以使包括泽纳纳·古斯芒在内的所有东帝汶政治犯都获得释放。

请愿者退席。

应主席邀请，朱莉·凯伦女士(英国支持东帝汶联盟)在请愿者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凯伦女士发言。

凯伦女士(英国支持东帝汶联盟)(以英语发言):英国支持东帝汶联盟想谈一谈1995年上半年东帝汶人权局势显然恶化的问题,并提出一些旨在扭转这种恶化并为适当的政治解决创造必要条件的措施。

我们注意到,1994年底或1995年初,东帝汶人称为“忍者”的那些蒙面恐怖匪帮的活动极明显地增加了。二月初,100多名妇女见到西蒙尼斯·贝洛主教时控诉说,“忍者”在帝力造成严重破坏,他们破坏财产、殴打、绑架并可能杀害平民。几天后,一名当地议会议员证实说,至少有八桩谋杀案是“忍者”干的。他还说,大约有5 000名农民因害怕这些匪帮而不再去地里干活,这可能造成饥荒,使更多的人死亡。几乎就在同时,有报告说这些匪帮已使大约29人“失踪”。

当地居民说“忍者”肯定是由军队招募、训练和提供武器的,并提供了关于给这些人的报酬、招募手续以及所发给装备的详细情况。

2月9日,五名年轻人被绑架,他们住的房子连同邻居的房子都被烧毁,看来是因为房主是被关押的毛贝尔抵抗运动领导人泽纳纳·古斯芒的亲戚。目击者说穿军服的士兵和“忍者”都参与了这次袭击。

当军事当局于2月中旬作出反应时,他们在整个帝力部署了部队,逮捕了约12人,他们很可能根本不是“忍者”,而是为了对付匪帮活动而建立的邻里自卫队的成员。

一位同爱尔兰记者大卫·肖克斯先生谈过话的消息人士说,这是“非常、非常有计划地和小心地除掉”那些“政治态度不太正确”的人的行动的一部分。这位人士谈到极为普遍的“失踪”现象。

在1月9日的一次和平示威行动后,11名年轻人被捕并受到指控,后来对他们的判刑与他们的“罪行”极不成比例。不过更严重的是,至少有其他五人失踪,甚至印度尼西亚政府在2月也证实这些人失踪了。帝力的居民说曾在1月发现有五具用米袋裹住的尸体,虽然这些尸体已被肢

解和腐烂得无法辨认,但他们认为很可能就是那五个失踪的年轻人。其他消息人士报告说,共有九人“失踪”加上据说一位去军队打听儿子的下落时被枪杀的男子父亲。

1月12日,在利奎卡村,六名平民被残酷地处决。后来参与此事的士兵证实说,这些人根本没有威胁他们,他们被枪杀时手被绑住。很可能他们中谁都没有参与任何犯罪活动。

在全国人权委员会开始调查此事件后,在利奎卡和帝力逮捕了30人,其中有些人或所有人可能是这起谋杀事件的目击者。我们必须指出,这一次直接有关的士兵确实被判了刑,刑期即使不完全符合其罪行的严重性,也至少不只是装饰性的。他们分别被判处四年和四年半徒刑。另一个可喜的事态发展是,更重的刑不是判给开枪的士兵,而是判给下令他开枪的上级。不过我们认为应向更高层军阶调查,以追究最后责任。我们还十分关切那30个身份不明的人的命运。我们还要强调,只要东帝汶继续在军事占领下,不论给军阶不很高的个别士兵多重的惩罚,象这样的谋杀还会不可避免地继续发生。防止利奎卡屠杀事件重演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帝汶人民能接受的政治解决。

就在最近,有一些关于在帝力发生神秘谋杀的报道。虽然“忍者”的袭击已减少,在春季曾有一个短暂的平静时期,上个月又发现两个年青人躺在路上,脖子被折断,脸被打烂。他们死在医院的途中。很显然这两人是在被谋杀的,居民们怀疑他们因为从事支持独立的活动而成为当局的目标。“所有年青人在天黑后都不敢出门”,一个帝力居民在电话上这样告诉路透社记者。

在过去几个月里还有些关于被关押在监狱中的人遭受酷刑的证据充分的报道。还得到特别是关于亨德里克·贝尔米罗、博比·沙维尔和荷塞·安东尼奥·贝洛的情况。他们遭到的酷刑包括殴打--亨德里克贝尔米罗遭到的毒打足以使他们的头骨骨折--用剃刀乱割以及使用电击。这三个人都是在等候审讯,尚未被判定犯有任何罪行。

1994年11月和1995年1月还爆发了严重的城市暴乱,起因是本地帝汶人和印度尼西亚定居者(主要是布钦人)之间关系紧张,显然是由于定居者杀害帝汶人而引发的。

这些暴乱使财产受到很大破坏,并造成一些死亡,而警察过分的暴力反应使情况变得更糟。

最后,印度尼西亚当局似乎一直对报界和其他国际观察员的采访活动实行限制,特别是在“忍者”活动最烈时期。

在这种极端严重的局势下,东帝汶很多人显然生活在恐怖之中,为朝着政治解决的方向前进,进行一次由联合国监督的全民表决的理想条件根本不存在。作为要使这种解决办法有可能实现的第一步,应迫切采取措施,减少紧张,减轻大多数人口现在不得不生活其中的恐怖。必须由真正和完全独立的人员驻扎东帝汶,这一点至关重要。这些人可以收集有关践踏人权的可靠情报,监督并希望防止发生进一步事件,并为处境艰难的东帝汶人民提供某种保护。

因此,我们促请联合国设立一个人权监测组,由该地区以外受过训练和合格的人士组成,该组至少作业3个月。我们强烈促请联合国考虑让这样一组人员长期驻扎。如果这不可能,我们将要求派一名秘书长代表常驻东帝汶首府帝力,这样一个小组或代表应该直接向曼谷的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或纽约的秘书长直接报告。这样做能保证他们的驻扎并不意味着承认印度尼西亚对东帝汶的占领。这实际上就是东帝汶天主教教会的立场,该教会不是印度尼西亚教区的一部分,它归梵帝冈,而不是印度尼西亚主教会的领导和管理。

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派驻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是不可取的。该领土极需实现非军事化,而不是再增加一股军事力量。因此,我们建议派一个文职特派团,最好是由在观察和监督人权事务方面有经验和受过训练的人组成,他们应该能够在紧张局势中担任一个劝阻的作用。人权教育也可以成为这一特派团任务的一部分。

我们希望,就较长期而言,根据“毛比拉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和平计划,联合国专门机构,如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也能在东帝汶设立办事处或派驻代表,以便建立没有军人控制的长期的稳定。人权状况的改善和紧张的减缓将会造成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可以开始一个进

程,导致就自决问题举行一次公正和由联合国监督的全民表决,并最终使东帝汶争取彻底非殖民地化的长期追求的目标最终取得令人满意的结局。

请愿者退席。

应主席邀请理查德·科克先生(爱尔兰声援东帝汶运动)在请愿者席位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科克先生发言。

科克先生(爱尔兰声援东帝汶运动)(以英语发言):我由衷感谢本委员会让爱尔兰声援东帝汶运动利用委员会的一部分宝贵时间作一次发言,我希望这一发言能够帮助解决已经降临在东帝汶人民头上,但是还在继续发生的悲剧。

爱尔兰处于一种不寻常的地位,能够同其他国家一起声援东帝汶被压迫人民。对于我们这些致力于东帝汶事业的人来说,爱尔兰曾经遭受殖民占领800年的事实不是没有意义的。尽管被当时,而且事实上现在仍然是一个全球性的大国统治几世纪,向往自由的火焰仍在爱尔兰人民的心中燃烧。当时有许多有理想的人们曾经努力奋斗争取摆脱殖民压迫的枷锁。我们祖先的理想在今天和当时具有同样的现实意义,因为他们的理想和一切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人民的理想是一样的。有时斗争似乎毫无希望。他们必然曾经感到非常奇怪,殖民国家推进一种分而治之的政策。但是,这并不是唯独在爱尔兰才有的情况——殖民主义者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推行他们的奴役和分而治之的政策。当我们看到今天落在东帝汶人民头上的这场悲剧时,当今的殖民主义与欧洲对各大洲人民的统治,几乎没有不同。

爱尔兰今天已立于世界各国之林。爱尔兰现在可以自由地决定它自己的命运,同它的邻国和平相处,并在世界舞台上代表它自己。爱尔兰没有许多国家所有的那种经济实力,但是有决心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发挥一个平等的作用。如今,过去所作牺牲已使梦想得以成真——这些梦想让爱尔兰能够作为联合国的一员,派出维持和平部队前往世界许多地区,包括卢旺达、波斯尼亚、黎巴嫩和其他地方。今天,爱尔兰是一个在世界事务中起作用的积

极成员，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前辈斗争。尽管在北爱尔兰还有困难——这是我们在诚实地面对和解决的自身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爱尔兰继续站在曾经和继续遭受外国统治的小国一边。

印度尼西亚政府希望世界看到的或许是帝力海滩阳光明媚的景象。然而，世界现在看到的越来越多是年轻人在和平抗议对他们的国家的占领时遭枪杀的情景。1991年11月在圣克鲁斯墓地牺牲的人们，同在南非的沙佩维尔牺牲，或在阿姆利则牺牲的圣雄甘地的追随者们没有什么不同，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阿里·阿拉塔斯先生曾经把东帝汶形容为“我们鞋里的一块碎石”。更加确切地形容是印度尼西亚外交官和官员们难以忘掉的一种羞耻。一个曾经是各被压迫人民的领袖的国家，一个争取和平、正义和自由斗争的人们的象征的国家，现在已被人们看作是一个殖民压迫者。

从历史上讲，爱尔兰和印度尼西亚有许多共同之处。同爱尔兰一样，印度尼西亚曾经遭受一个世界性强国的入侵，但入侵印度尼西亚的是荷兰，同在爱尔兰一样，印度尼西亚产生了许多有理想的男女，他们准备作出最大的牺牲，以便后来者能够掌握他们自己的命运。通过他们艰苦的独立斗争，他们保持着自由的火焰不灭。在今年印度尼西亚独立五十周年的时候，仍然需要具有理想的男女。他们有责任同他们的先辈们一样，纠正一种显然错误的状况。他们有责任恢复印度尼西亚作为世界事务中的一个重要成员的权利，不仅是在不结盟运动中，而且还在联合国一级。但是，在东帝汶悲剧得到解决之前，印度尼西亚不可能起这样的作用。看来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自己曾经遭受严重痛苦的国家，不能或者不愿意把它遭受的苦难和它已经并且继续对东帝汶人民所作的行为联系起来。

在过去几年中，爱尔兰在国际上推动东帝汶问题方面起着主要的作用。东帝汶人民所遭受的境遇中有一种使大多数人立即感到同情的东西。这种同情不仅仅是对军事残暴程度的震惊，它还带来了一种使情况能够有所改善的愿望。同东帝汶一样，爱尔兰曾经几乎被它最近的邻国所吞没，它的特征、文化和国家权利几乎被庞大的实力和暴力所淹没。东帝汶现在的斗争，爱尔兰在1922年独立之前的斗争，以及印度尼西亚在1945年以前的斗争，都是人类精神不可破灭和普通人们战胜极端困难的例子。

在这方面，今年是“大饥荒”以来的第150年，我们作为一个人民正在努力接受一个直到最近还被置之不理，辟而不谈，或者被当作最好被遗忘的我国历史上的一大事件。但是，在一块富饶的土地上被活活饿死的将近一百万爱尔兰农民的幽灵不断地触动着我们集体的良知，从中东欧的犹太人、美国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土著人一样，我们先辈的灵魂呼叫我们不要忘了他们。在今年解放纳粹集中营的第五十周年，经验告诉我们，有人希望我们不要从历史上吸取任何教训。

在印度尼西亚入侵东帝汶第二十周年的时候，身处权势地位的人不希望我们知道东帝汶所发生的情况，或者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发生。除了那些要剥夺东帝汶人民真理、公正和和平的人以外，所有人都显然知道，没有发生过有效的自决行动。有人坚持说，东帝汶人民通过与印度尼西亚合并寻求独立。这种说法不仅已经受到联合国，而且也受到国际社会的驳斥。即使那些因为经济上的一时利益而选择站在印度尼西亚一边的那些国家也坚持，自从印度尼西亚非法占领东帝汶以来，没有发生过有效的自决行动。

无论我们是否喜欢，印度尼西亚占领的问题不会消失。日复一日，东帝汶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各大陆很多普通的人民正一致拥护东帝汶的事业。他们同我们一样，知道一种极不正义的行为已经发生。在发展中世界里，非常懂得殖民压迫后果的人民正加入东帝汶的事业，正如他们对种族隔离之下的南非所作的一样。

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最近的努力是一种可喜的迹象，表明这一极不正义的现象仍列在联合国的议程之上。布特罗斯-加利先生进行如此多的努力，也表明国际社会要解决这一冲突，把该问题看作是国际问题，而非殖民大国之间的问题。然而，使我们这些关心东帝汶未来的人感到震惊的是：前殖民大国和现在的殖民大国是正在进行的对话中的主要参与者。是谁代表东帝汶人民，又是谁进行如此勇敢的斗争以从其祖国驱逐了一个外国列强？

直到东帝汶人民在进行中的会谈中取得代表权之前，我们仍然不会找到解决办法。东帝汶抵抗运动领导人萨纳纳·古斯毛先生仍被监禁在印度尼西亚，从而违反了关

于被占领土上对待犯人的《日内瓦公约》，这一事实表明，必须对雅加达施加更多的压力。古斯毛先生必须参与继续进行的谈判。在20世纪后期，直到印度尼西亚政府认真寻求解决之前，印度尼西亚的殖民主义似乎将继续给一个一度受尊敬的国家带来耻辱。

爱尔兰的历史使我们坚持认为不可忘记已牺牲的200 000名东帝汶人。为尊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绝不能使那些占据一个弱小领土的人的计划不可得逞。

应主席邀请，西蒙·德福先生(天佑学院(澳大利亚))在委员会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德福先生发言。

德福先生(天佑学院)(以英语发言):我叫西蒙·德福，是一名注册护士。我于1989年至1991年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莫纳什大学进行了初级培训。1992年，我开始在墨尔本大都会地区的各医院中工作，主要是在事故和急诊部。在1994年期间，我在艾尔弗雷德医院的创伤中心工作。大约是在1994年的年中，我开始对我所做的创伤工作感到不满意。

我当时确定我想在国外做一些护理工作。我同撒肋爵会教徒及其大主教朱利安·福克斯神父联系。我起初通过他们得到一些在南美洲进行的工作，但此事并未成功。1995年1月下旬，福克斯神父建议我去东帝汶。我在此之前确实对东帝汶一无所知。我对此地无任何了解，而且从未附属于任何政治团体。我对东帝汶所知道的唯一的情况就是，这是一个自1975年以来被印度尼西亚占领的国家，那里发生了很多不幸的事。

2月1日，福克斯神父向我提供了一个职位。我已作好准备，于是我就启程了。我于2月8日搭乘飞机离去，前往东帝汶。在2月1日至8日的一周内，我开始尽可能了解有关东帝汶的情况，这使我有机会了解这一地方的唯一一段时期。我读了一份由赫尔达·比格尔医生写的题为“东帝汶的健康情况”的报告。福克斯神父也尽其所能向我介绍情况，我也读了一本由詹姆斯·邓恩所著的名为《遭背叛的人民》的书中的某些章节。

显然贝罗主教向撒肋爵大主教约翰·墨菲神父发了一份电传，要求让一些医疗工作者前往东帝汶帮助建设医疗所。这是我对为什么被派往那里的理解。尽管印度尼西亚当局只给我两个月的旅行签证，但天主教会给我的印象是：既然我以自愿医疗工作者的身份而不获得任何报酬，我将获准履行医护的职责。

我于1995年2月8日启程前往东帝汶。我在古邦住了一夜，于2月9日离开古邦直飞帝力。我在帝力在贝罗主教的住所住了一夜，当我到达机场时，遇到了武装警卫，并被告之我需要向其各位官员报告。我在机场也遇到前来见我的一位教会工作者，他得以让武装警卫确信我是一位教会的雇员，并将于次日向官员们报告。于是武装警卫们让我前往主教的住宅。那一夜我得以同贝罗主教交谈，他告诉我帝力的局势由于一个联合国特使团的到来而变得紧张，该团正调查六名于1995年1月在1个叫作利基萨的地方被即决处决者的死亡情况。

第二天，我向各个警察和军士官员报告并向移民部门报告。我还要向卫生部门的首领报告，因为我是一名希望工作的注册护士。他叫亚历克斯医生，是一位讲流利英语的印度尼西亚国民。那一天我需要同许多政府官员交谈，因为我是应该国天主教会首脑要求而前往协助的自愿医护工作者。

最后我得到他们的许可，但他们要了解我将去那里以及我将做什么。在此时刻，亚历克斯医生告诉我，他们的医疗制度十分充足，因此他们不要外国人参与。因此我将不会进行医疗工作。我所拥有的有限的医疗设备也被拿走。我在那里将只是一名观察员。

我于当日下午同那名我前一天遇到的教会工作者一道启程，前往一个位于东南部的名叫苏艾的地方。我们到了那里的天主教医院。我刚到达时，必须再次向警察、军队和卫生官员报告。我每到一地，这都是一种规定。我在苏艾仅呆了一个星期，我很快将解释其中的原因。主教派我到了那里的主要原因，就是感到那是一个反抗程度相对低的地区，因而我会很安全。

我开始以可能的手段在我能够办到的方面提供帮助，同时住在医院。那里的教会正开办一个大约有30个床位

的医院,它的服务设施严重不足。他们几乎没有什么设备或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就其力求为大批人提供的服务而言,他们的设备十分不足。

在苏艾区,我遇到各种印度尼西亚的医生。我还见到了卫生部门的主管,他非常高兴地带我到处参观政府办的医院,卫生所和他们在哪里提供的服务。结果,我看到了天主教会办的由神职人员服务的医院,也看到了印度尼西亚政府办的医院。

我注意到的主要区别是很多东帝汶人害怕到印度尼西亚医生那里看病。他们认为这些医生以及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药品是“种族灭绝”的一部分。我从教会工作者那里听到的报告指出:母亲们带着她们的婴儿前往婴儿福利中心,她们在那里接种免疫,而一个月后,她们的婴儿却死亡。这并非是出现一次的情况。一名教会工作者告诉我,他们听到有一个地方有300名婴儿死亡。我常常在前往这些医生处及印度尼西亚办的医院时,检查一下各种药品。我所看到的药品都是象抗生素之类合法的药品。然而,它们常常是过期的—有效期常常过了一年有时甚至2年。

尽管政府办的医院拥有各种设备和设施,但几乎没有什么人使用它们。它们通常是空闲着的。另外极端的情况是,天主教会办的医院没有任何设备和医药,有时50甚至100人在那里排队,因为人们相信教会。人们知道他们在那里得到的是合法的治疗,所以他们对之信任。因此,如果人们无法去教会办的医院的话,在得病时就常常只呆在家里。他们宁愿继续患病,而不求助于印度尼西亚的卫生当局。

我在苏艾时,一名印度尼西亚医疗工作者告诉我一些卫生部门的医生如何同药品公司作交易,用政府的资金购买廉价和过期的药品,然后自己留下剩余资金,再以更高的价格把药品卖给医院。药品本来是免费提供的。所以,医生们就获利两次。这只是我所了解到的非法交易之一。

2月10日或那一天前后,当时我在苏艾,我遇到了总督即“bupati”。他也是一名天主教徒。他建议我前去看一看移民区。他说:“去巴,告诉他们印度尼西亚人正在为帝汶人作些什么。”

我不知道他是否意味着我告诉他们印度尼西亚人正在作多么好的事,还是正在造成多大的破坏。

我在前往移民区时,受到秘密警察的跟踪。这很显然。我在苏艾的大多数时间都需要持续向警察和军事官员报告。我在帝力逗留的一天内,也注意到类似的监视。准军事警察会带着警棍开车到处走,在街头审问人们。

如上所述,我是作为一名自愿医疗工作者由教会派往东帝汶,仅此而已。我对印度尼西亚政府禁止我帮助东帝汶人民改善其健康状况感到愤怒,当时显然有这种援助的必要。大约在这个时候,我决定开始拍摄照片来记录我的见闻。

也是在这次我第一次遇到了枪口对准我的情况。我在苏艾的市场上拍了一张照,随便的一张照片,只是一张旅游者拍的照片,但是,一个士兵在我照像时偶然走过。他拔出手枪并且其对准我,然后让我和他走。他认为我是一个记者。我不得不回到指挥官那里并且说明我的情况。这时,他们认定我是一个记者并且想把我从这个地方驱逐出去。教会职工为我说话,说,“他不是记者;他只不过是一个旅游者。别管他。”因此我拿回了我的照像机和胶卷。

那天晚上,一名警察显然找过与我一起工作的一个印度尼西亚医生,威胁并且告诉他,如果他不写份关于我每天24小时所干的事情的报告,那么他们会带走他的妻子。他对一名教会职工说过这件事,虽然我在离开苏艾几天之后才知道。结果是,这位医生自然很害怕。因此,教会职工让我呆在医院的建筑里,以便总可以完全确定我在哪里。我尽量协助,虽然我不能正式地做太多事。但是,我看到医疗保健制度的工作情况。人们很怕到政府医院去。他们害怕用那里的药。天主教医院工作人员希望有一种制度,使他们能够走访村庄并且查问那里人的情况,但是,卫生部门却禁止他们这样做。

我看到帝汶村民肺炎晚期的案例,人们吐出鲜红,带泡沫的血。血甚至吐到我身上。虐疾也在苏艾流行。每个人都有,正如卫生部门一些成员向我所承认的那样。在东帝汶旅行的加拿大大使及其一组人员在2月10日或11日到达苏艾。他们有兴趣地和我交谈并且听取我对所看到的

情况的看法。个别成员把我拉到一旁并且问我为什么在这里，我对他们讲了几乎我看到和经历的一切。他们对我说，他们想帮助，但是，因为他们是大使并且有外交豁免，他们必须保持中立。他们劝告我“低着头”，并且对我说我做的事情十分危险。然后，他们问我是否想让任何人知道我的状况。我给了他们几个名字，他们说他们将努力通知这些人。

正是在这段时间内，医院的教会职工开始听到许多关于和他们一样的两个人最近在印度如何遭到袭击的议论。据说，如果他们不小心，他们在苏艾可能会遇到同样的事。我很快便认识到，这些人如果遇到任何事，那么不会是因为他们的所做所为，而是因为我的存在，因为印度尼西亚人想整的是我。他们已经指控我是记者，他们曾经有一次将枪口对准我，并且他们看到我和加拿大小组交谈。他们恫吓教会的理由是相当明显的。我第二天对教职工说，我将离开，因为我使他们受危险。

他们为我离开苏艾安排了交通工具。司机是一个约19岁的帝汶青年，他的家有九口人。他对我说，他的母亲被强奸了，他的父亲被杀害了，他的一个兄弟仍然去向不明。任何被人看到和我在一起的人都冒风险。这个孩子对我说，对他来说，他的家庭是监视对象，并且他认为被人看见和我在一起是个荣誉。他的话是：

“我在是眼泪中长大。我生活在眼泪中，我将死在眼泪中。我在出生的一刻便已经死了。”

那天我直接回到帝力。我藏在一个卡车的后面，因为有人认为我会安全通过整个农村的军事检查站。士兵经常在这些检查站受贿以补充他们相当低的收入。

我直接回到了帝力，在大约2月16日或17日到达那里。我和一个贝洛主教的人交谈，他说英文。他告诉我，在我离开的那周来了几邦他们所说的“忍者”——一群晚上在帝力四处恐吓人们的人。他们不知道这些“忍者”是谁。军方总是说，帝力没有“忍者”。我在一份印度尼西亚报纸上确实看到一篇文章，该文章用英文写到“在帝力没有忍者”。但是，帝汶人曾经抓住一些“忍者”，并且发现他们实际上是来自印度尼西亚西帝汶的带红贝雷帽的

突击队员。这些突击队员平民打扮，夜间四处出动和袭击人们。

他们的目标通常是印尼人认为的革命阵线同情者。贝洛主教那天晚上在总督的家里，力图与他争论以制止“忍者”的袭击，因为在其中一次袭击中一人被砍了头。帝汶人想埋葬尸体，但没有找到头，他们想把它要回来。我在苏艾的那周期间，一些人告诉我，整条街被烧毁和15人被烧死。那天晚上我见到贝洛主教，他决定派我去东部一个叫洛斯帕洛斯的村子。

我有两封警察和军官给我的官方信和一封贝洛主教的授权信，说明我是为教会工作的医务人员，我应该有行动自由和做任何我可做事情的自由。到达洛斯帕洛斯时，我得知加拿大大使也从苏艾到了那里。这可能会使军方认为我是记者，因为我似乎跟着大使走。我再次见到加拿大一行人并且和他们一起度过更多的时间。

我大概在2月17日到达洛斯帕洛斯。我被送到一所撒肋爵教友和牧师办的学校，他们正在训练约500学生。但是这些学生的年龄不是正常学生的年龄。由于各种原因，最高年级的学生通常是25岁或更大，因为他们的家庭没钱送他们上学去。在许多情况中，他们呆在田里，帮助收割。

我两个月签证的剩下七周是在洛斯帕洛斯度过的。我在第一周时相当低调。我真的没有干任何事，只是跟着大使走走，和儿童玩耍，或尽可能地提供帮助。只在大使离开后军方才离开。一个在那里呆了15年的牧师告诉我，印尼人曾说过在帝汶的士兵员额如何减少。他说这是不正确的；他们只不过换了服装。他们现在不穿军装而穿便服，因此他说，说话时必须小心。他自然由于我们在大山里，大多数人相互认识。我再一次被告知，我必须向洛斯帕洛斯的警察局报到而且我不能从事医疗工作。

但是，我仍然试图尽我所能，以我的医学知识提供帮助。印度尼西亚人拿走了我带去的一背袋急救器械。他们唯一没有拿走的是我个人的一个袋子。袋里面装着有限的器械，如疟疾片、一些抗生素、一只个人注射器和一些针头。这些就是我使用的器械，但是没有使用很久就用完了。我常常和牧师一起去外围的村子，尽我所能提供一些帮助。我访问了保健中心和政府办的医院。它们都空

着。在村子里,我看见患有肺结核、疟疾、耳/眼感染、呼吸道疾病等毛病的村民。

当人们了解到我属于教会,他们知道可以信任我。在我刚被作为一个护士介绍给人们,往往就有5到10人排队要看我。有一次,我想有多到80人排队要我为他们看病。人们常常求人帮助。由于我的器械很少,做不了很多事。我现在仍然有一件衬衫,上面染有一位得了肺结核的三十几岁年轻妇女咳出的鲜血痕迹。我常常看见一些骨瘦如柴的人。他们由于有肺结核,虽仅20几岁,但看上去好像已经50或60岁。

我记得有一个女孩由于蚊咬,患上眼疾。在给她治疗的过程中,我变得非常沮丧,也很气愤,因为人需要消炎药。我完全知道需要什么。因此,我去了一家印尼政府办的医院。在我到那儿时,那里没有医生,但是我闯入药房,拿了我们需要的东西。我签了字并把药品记在教会的帐上。用澳大利亚货币计算,这些药品本来只值2.50美元。那个女孩的眼睛好了起来。印尼的医院有设备,但是东帝汶人民没有安全感,不敢去。

我还听到其它报道,包括关于怀孕妇女去医务所,印尼医生告诉她们应该打胎或注射Depo-Provera。我没有亲眼看见,但常常听到这种报道。大多数帝汶人是天主教徒,让她们作这种事是不能原谅的。在我去过的几乎每一个村子,我都碰到5或6位妇女声称她们被强奸。

我在这些东部的村子里遇见许多不同的医疗或外科问题。当我们在军方看不见的地方时,人们会向我展示一些我不能解释的伤痕,如鼻隔膜或阴茎烫伤痕迹。我仍然的确不知道这些伤痕是怎么造成的,但是我目睹了许多这类烫伤例子。伤痕比香烟烧伤的痕迹更大,而且更暗。我不知道这些是酷刑所至还是什么别的东西造成的。

在人的背上异常形状的伤痕也很普通。我说不出这些伤痕的原因。我经常在东帝汶和许多孩子踢足球,尽管气候炎热,许多人不脱背心,因为对他们背上的伤痕感到不好意思,这些伤痕是过去受刑的结果。在我呆在东帝汶的两个月中,我没有遇见一个在印度尼西亚占领期间其亲戚没有受过刑或被杀害的帝汶人。我没见到过一个能说

他的家庭未受触动。我去过许多村庄,我见到许多我无法解释的伤害。

我在东帝汶时从未真正见到任何人受刑。我只是设法处理人们因受刑造成的问题。我后来被告知这些是人们被捆在金属床上时造成烧伤的痕迹。当被捆在金属床架上时,他们把电流接通帝汶人鼻腔,因为鼻腔湿润,是良好的导体。另一股电流接通阴茎。就是这个造成了阴茎和鼻腔的烧伤。

我被告知的另一种形式的酷刑是把人放在水桶中。水只注到人的鼻子下面。这个人无法说话而且其实也不能呼吸。这一办法不会留下任何伤害或痕迹,因此是印尼人喜欢用的一种办法。我被告知常用这种方法逼供,或用来达到他们想达到的其他目的。

3月初澳大利亚大使一行抵达。大使的姓名为阿兰·泰勒,他的一等秘书是阿列斯泰尔·科克斯。他们有一大帮印度尼西亚军方人员跟着他们。我告诉这些澳大利亚外交官我无法进行任何保健工作。我马上从大使那里得到的印象是他根本不想知道我是什么人。有一天晚上在我告诉了科克斯我看到的情况和告诉澳大利亚政府为帮助帝汶人民作的不够之后,我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很明显他们不想知道我看到了什么,他们要我——用他们的话说——“走开”。阿列斯泰尔·科克斯说“我们希望你不要对媒体谈话。”

我在东帝汶注意到的另一个主要麻烦是缺乏自由和确切而真实的信息。几乎任何消息都无法传到国外。例如,我知道1991年11月圣克鲁兹屠杀,但是牧师们告诉我其后又发生了6起相等规模的屠杀。关于这6起屠杀,我听到有报导说圣克鲁兹屠杀的幸存者被载往医院然后用石头击死或者以注射使其致命。所有这一切使我更下定决心把我在东帝汶拍摄的胶卷送出该国。

在我所到各地,我都经常看到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和军事人员的车队。甚至在帝力——那是一个安静、沉睡、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的小地方,我被告知住扎不少军队防范人民。它使人们不敢做任何事情。每一座房子上面都有一个号码和一个名字,那是住户的名字和他们必须向其报告的官员的名字。显然,每天军方指挥部都有人来

到村庄来查看各个人以保证他或她还呆在那里。我指的是我在东帝汶整整两个月中所看到的每一个村庄的房子。

我曾抱怨说有一个军方陪同在我呆在东帝汶期间大部分时间里都跟着我，军方指挥部告诉我这是为了我的安全，以防发生意外。我知道这是个笑话，因为没有东帝汶人会来碰我。每个人都想帮助我。因此，当军方指挥员这么说时，我的朋友们把他解释为可能出事的一种警告。也许印度尼西亚人可能会晴天霹雳地向我开一枪，但是印度尼西亚人会反过来说那是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地的过错。我呆在那儿的第一个月里我觉得会被杀死。

我经常看到士兵们在各个村庄中走动。那不是一两个士兵；而是有军车车队。我们在开车的时候经常会看到3、4辆装有全付武装士兵的卡车。当澳大利亚大使在那里时他在一次官方午宴上问到，那时在帝汶有多少战斗军队。军方指挥官说他不能回答，他不知道。我觉得很奇怪，一个军队指挥官不知道他的兵营里有多少士兵。然后他接着说也许不到一百。这一定不对，因为仅在洛斯帕洛斯一个地方就有一个很大的军事基地，其住房可以容纳至少200到300名士兵。我们开车外出时经常看到装满全付武装士兵的军车队。

在我呆在那里的6个星期中，我去过东部的一个村庄，当我走进一片空地时看见一个小孩遭到殴打。我感觉到我闯入了某个事故的现场。关于这个孩子我只知道他8岁。我走进这片空地，孩子正被一名印尼士兵用枪托殴打。他的脸半边被打烂了。有一大群人围观。其中一些被挡住。我想这些人是他的父母。我走过去想阻止士兵打烂这孩子，这时我却被这个士兵用枪托击中我的背部。在这个事件之后，又有人第二次用枪口对着我。

这件事发生和过去都很快。人们后退了，那个孩子被某人一把抓住送走。我设法到各医院去了解有没有孩子被送来。我被告知一名8岁男孩曾经送来，但他们只告诉我这些。对这件事情守口如瓶。我对这个事件记不得多少。我眼花了乱，但我的确记得这孩子的眼珠子几乎从脸上掉了下来。我无法了解任何详情，而我也没有告诉牧师，因为我已经知道我对他们已成为一个头痛的人物。但是当我看到这孩子被殴打时，我毫不犹豫地站到这些士兵们的面前。

我去过一些村庄，那里的妇女当着我的面咳血，小孩说他们过去如何遭受殴打。但他们都发出同样的信息：“请救救我们！”他们有时向我大声叫喊，“请救救我们！”我无法对这种情况置之不理。

最后，我的两个月逗留将要结束了。我回到柯摩罗，那是帝力的郊区，我在那里渡过最后几天。1995年4月9日我带着胶卷回到澳大利亚，并带回了我刚经历过的一切以及，更重要的是，我的一条命。

请愿者退席。

应主席邀请，沙伊纳先生(东帝汶行动网络)在请愿者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沙伊纳先生发言。

沙伊纳先生(东帝汶行动网络/美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委员会抽出时间听取我和其他请愿者的发言。

我是东帝汶行动网络在美国的协调员。我也代表东帝汶国际联盟，那是一个附属公共新闻部的非政府组织。我要代表该联盟感谢季米特利切夫先生及其能干的工作人员协助促成国际联盟小组成员参加今天的会议。

我首先想指出昨天新闻中的一个积极事态发展——缅甸将昂山苏姬从软禁中释放了。几年来，国家恢复法律秩序委员会把苏哈托总统捧为学习的榜样。我希望印度尼西亚政府能学习缅甸的榜样释放桑那那·吉斯茅和其他囚禁在印度尼西亚监狱中的东帝汶政治犯。

今天我代表成立于1991年底的一个基层运动——设在美国的东帝汶行动网络在委员会发言。我不重复其他人的证词，但将向委员会提供一些最近在美国的有关事态发展的信息。尽管在美国对印尼在东帝汶的军事占领日益有所认识，但美国政府的立场仍不明确。

去年美国国会继续禁止给印尼的国际军事教育和训练援助。这一禁令于1991年帝力屠杀后不久就在实行。

此外，国会将国务院发起的一项禁令定为法律，这项禁令禁止美国公开和私下向印尼出售小型和轻武器以及防暴装备。在这两件事情中，东帝汶正在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是使国会感到难过的原因。

今年美国参院可能将扩大军事销售的禁令，以包括装在直升飞机上的装备。虽然在众院有行动恢复美国对印尼士兵的某些训练，但这一训练将只限于民主、文职对军方的控制和人权等课题。

委员会成员知道，克林顿总统去年11月在雅加达和苏哈托总统以及其他地区国家元首一起参加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首脑会议。当29名勇敢的东帝汶青年走访美国大使馆而引起全世界注意时，克林顿总统说：

“美国立场以及我从1991年以来也就是我就任这一职务之前很久以来的立场就是，东帝汶人民应对其地方事务有更多发言权。”

这是美国总统迄今最明确的讲话：美国政府仍然对印尼在东帝汶的统治质疑。

1995年2月，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其关于印度尼西亚人权问题的年度报告。该报告称这个国家“非常独裁”，并阐明：

“政府仍在严重侵犯人权，在某些领域，特别在言论自由方面，政府背离了更加开放的长期趋势，镇压程度显著增加。最严重的侵犯人权情况包括，人民仍然不能改变其政府和东帝汶持不同政见者受到残酷镇压。法外屠杀的报道有所减少。保安部队仍在严刑拷打被拘留者：一些报道称，使用酷刑情况有所减少，但没有确凿的统计数字。法外逮捕和监禁仍在继续。使用过分暴力对付嫌犯或认定的捣乱者也仍然存在。（“印度尼西亚人权作法”美国国务院，1995年2月1日，第51至62行）

“关于东帝汶，自1991年帝力事件发生后在寻找失踪人员下落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部队人数仍然高得不合情理。（同上，第89至91行）

“政府为寻找1991年军方在东帝汶帝力枪杀平民造成的失踪和死亡者的下落所作的努力仍然不够。本年度期间没有解决任何在军方给亚洲人权观察报告中仍被列为失踪者的额外案例。政府发言人暗示，他们未能找到这些失踪者主要是因为这些人不愿被发现。但许多知识渊博的观察员仍然认为，大多数失踪者都已死亡，而武装部队中的某些成员也知道其遗体所在处。”（同上，第184-193行）

报告接着详尽阐述了酷刑、失踪、恐吓新闻工作者、骚扰宗教界和其他由印度尼西亚有争议的非法军事占领所产生的侵犯公民权和人权的情况。

今年2月，一个由9名参议员组成的两党小组致函克林顿总统称：

“我们认为，美国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应该使我们能够有效地向雅加达政府阐明我们的关切”。

国会人权问题核心小组的两党成员也发出类似的信，表示关切：

“在人权方面没有进展和一直有酷刑和其他侵犯人权行径的报道”。

美国的一些前任官员也表示遗憾，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在今年早些时候被问及东帝汶问题时说：

“我们曾在外交政策上犯错误，我们过去犯过错误，现在也在犯错误……”

今年3月，助理国务卿约翰·沙特克在国会作证称，华盛顿“非常关切”印度尼西亚人权情况的显著恶化，其中包括6名东帝汶平民在利基萨受酷刑并被杀害的情况。利基萨先生4月份访问了东帝汶。他在访问后立即在雅加达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评论称：

“美国非常强烈地赞成增加东帝汶人民参与决定其自己政府的机会，当然还要增加所有领域的机会，不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机会……”

“人数相当多的部队驻留东帝汶问题当然是有关处理这一人权问题进程的一个重大关切。”

然而,美国国务院、军方和国会的一些成员都在要求美国减轻在东帝汶问题上对印度尼西亚的压力,并要求恢复不受限制的武器销售和军事培训。这场辩论仍在华盛顿激烈地进行,印度尼西亚在众议院又有了一个新的主要支持者:国外行动拨款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索尼·卡拉汉。印度尼西亚主要飞机制造公司IPTN将在卡拉汉先生选区亚拉巴马州的莫比尔开办制造业务,这也许完全是巧合。

虽然东帝汶行动网比不上印度尼西亚的游说伎俩,但我们非常积极,并在美国几乎所有五十个州有成千上万名成员。令东帝汶行动网感到鼓舞的是,联合国的努力已导致上个月在澳大利亚举行有各方参加的帝汶各派间对话,而且那次会晤承认,大会第37/30号决议仍然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框架。特别报告员巴克雷·瓦利·恩迪亚耶先生的报告和高级专员何塞·阿亚拉·拉索先生即将访问东帝汶也使我们感到鼓舞。我们敦促印度尼西亚政府同特别委员会、秘书长和人权委员会合作,努力使东帝汶人民实现自决。虽然步伐有时非常缓慢,但行动的方向是正确的。我们仅希望能够在大量更多的失踪、屠杀和任意逮捕事件发生前达成一项解决办法。

两天前,我被一个来自帝力的电话惊醒,告诉我有关自6月30日以来从未被人看到的3名东帝汶人的情况。打电话的人担心他们已被印度尼西亚士兵带走,或可能已被杀害。东帝汶人民20年来忍受的恐怖和死亡太多了。本委员会可以在结束其恶梦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1995年是周年之年。我们上个月庆祝了联合国五十周年,下个月将庆祝印度尼西亚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五十周年。今年12月是《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通过三十五周年。不幸的是,经过几十年非殖化运动后,本委员会仍需存在,包括东帝汶在内的一些领土仍不能享有其合法和合乎道德的自决权利。

12月也是印度尼西亚入侵和占领东帝汶并进行种族灭绝二十周年。我们希望,联合国可以同东帝汶人民和印

度尼西亚、葡萄牙政府合作,在又一年结束前结束这种不正义现象。

请愿者退席。

应主席邀请吉尔·斯滕伯格女士(意大利声援东帝汶人民团体联合会)在请愿者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斯滕伯格女士发言。

斯滕伯格女士(意大利声援东帝汶人民团体联合会)(以英语发言):我的名字叫吉尔·斯滕伯格,我代表意大利声援东帝汶人民团体联合会向委员会请愿。本联合会成立于1991年,它是一个包括参与支持东帝汶人民争取自决斗争的各非政府组织、地方团体和个人在内的联盟。本联合会促进各新闻和觉悟运动以及各声援项目。

1995年是印度尼西亚入侵东帝汶二十周年。在过去20年中,二十多万东帝汶人被印度尼西亚武器杀害、被饿死或因入侵所造成的动乱致死。在一些长期冲突都已获得解决这个国际形势下,我们认为,可以找到一种尊重东帝汶居民权利的和平解决办法。

就此而言,我们认为应该指出,在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人民冲突范畴内,新的和平机会是在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开始直接会谈时开辟的。同样,在英国政府和北爱尔兰天主教社区之间冲突范畴内,停火是在英国政府和由社会民主劳工党和新芬党代表的北爱尔兰天主教会有可能开始直接接触时实现的。

因此,印度尼西亚军队在东帝汶不断侵犯人权的情况令我们感到忧虑,大赦国际已在几份报告中对这些情况作了描述,联合国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也在报告中描述了圣克鲁斯大屠杀的情况。我们要求通过组织由联合国代表监督的公民投票,尊重东帝汶人民的自决权,东帝汶在形式上仍然是在葡萄牙主权下进行非殖化的一个领土。这种解决办法还得到了地方天主教会的支持。我们还要求允许代表由毛比拉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所体现的东帝汶人民抵抗运动的一个委员会参加葡萄牙和印度尼西亚在联合国内进行的和平会谈。

拉莫斯女士(法学家支持东帝汶国际论坛和美洲律师协会)(以西班牙语发言):在1991年11月12日圣克鲁斯大屠杀之后,东帝汶案件便受到国际注意。东帝汶的最近事件证实自从1975年占领以来,在该领土的局势已经恶化,印度尼西亚军事部队毫不犹豫地平民百姓和民族解放运动滥用武力。

在实施东帝汶人民的自决权方面联合国的介入是一项必要条件,因为这不仅是葡萄牙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问题,而是殖民问题。我们现在正处于铲除殖民主义国际十年的尾声、21世纪的边缘,本委员会的任务是实施非殖民化大宪章的原则:第1514号(XV)决议。因此,联合国一定不能仅仅恢复第31/53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第384(1975)和389(1976)号决议的文字而应恢复其精神。这些决议承认东帝汶自决权和领土完整、指派葡萄牙为管理国、谴责1975年入侵并呼吁印度尼西亚政府从该领土撤出其军队。

去年以来,我们感兴趣地注意到值得特别委员会认真审议的一系列事件。其中一些如下。

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的讨论中,东帝汶是一个主要问题,1994年11月12日—圣克鲁斯大屠杀周年—蒂汶学生跨过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的大门,要求同克林顿总统谈话,并呼吁释放其领袖桑那那·古斯毛和其他政治犯。他们还要求承认自决权和谴责占领。虽然有国际压力,但是没有迹象表明印度尼西亚政府正在减少其在东帝汶的军事存在。面对该领土的加速军事化,这对东帝汶人民造成了恐惧和威吓的源泉。在所谓的“忍者”或治安维持会会员到达帝力和农村时,这种恐怖的气氛就更为明显了,这些人是致力于恐吓平民百姓的。

将各族人民进行移民的进程仍在继续。

1月12日,印度尼西亚军人在利基萨区杀害了6名帝汶平民。

尽管有这些事实,严酷的现实是这些并非孤立的行径,而是帝汶人民每天所经历的占领的残忍。许多国际法专家将入侵科威特同东帝汶案例相比。20年已经过去了,联合国未能实施其各项决议。这两个案例有两个共同方

面:违反国际法和承认各国人民自决和独立的权利的普遍原则以及联合国的反应—联合国是负责保护谴责强制和非法合并他人领土的原则的一方。

在国际法院对葡萄牙对澳大利亚案例最近作出的决定中,尽管法院没有决定该案的是非曲直,但是对自决权作出了重要的声明。在第29段中,法院确认:

(以英语发言):

“法院认为,葡萄牙所来自《宪章》和来自联合国惯例的各国人民的自决权具有对所有人的适用性,这一说法是无可指责的”。

(以西班牙语发言):

法院还作了以下发言:

(以英语发言):

“此外,为了适用《宪章》第十一章的目的,大会为自己保留了决定哪些领土应该被视为非自治领土的权利,它将东帝汶看作这样一种领土。至今为止,大会有关附属机构一直不断将东帝汶当作这样一种领土来对待。此外,安全理事会在其第384(1975)和389(1976)号决议中明确呼吁尊重‘根据大会第1514(XV)号决议东帝汶的领土完整及其人民对自决的不可侵害的权利’”。

(以西班牙语发言):

目前,尽管有所有这些曲折,帝汶人民希望他们的正义事业将受到更大的国际重视。关于法外,草率或任意处决的特别报告员巴克利·瓦利·恩迪亚耶先生的报告对此作出了贡献,在秘书长主持下同葡萄牙和印度尼西亚的代表举行的会议、在奥地利举行的东帝汶内部对话以及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即将进行的访问也对此作出了贡献。

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中建议由“具有公认的独立性、不偏不倚和专门技术的个人”对圣克鲁斯大屠杀进行新的调查(E/CN.4/1995/61/Add.1,第79(a)段)。报告还建议应该将管辖移交给普通的平民司法系统以便确保调查将是公正和透明的,并避免军方进行干预。报告最后说,

在那次示威中所造成的死亡是有计划和旨在镇压公众舆论和政治上不同意见的一次军事行动的一部分。它不符合国际人权准则。恩迪亚耶先生将这次示威描述为手无寸铁的平民所进行的和平示威。

此外,6月在奥地利召开的会议几乎把所有的帝汶政治各方都聚集在一起了。尽管基本问题——解决东帝汶的政治地位——并没有得到讨论,然而还是有某些积极方面。会议为在帝汶人民之间未来进行会谈扫清了道路,并发表了一项重要宣言。由协商一致意见通过的伯格·施莱宁宣言确认有必要在人权和其他领域采取步骤以促进和平、正义和社会和谐。它确认东帝汶对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权利以及对通过教授Tetum语和葡萄牙语来保持文化特征的权利。与会者承认在秘书长主持下在葡萄牙同印度尼西亚之间举行的谈判对于为走向一项可接受和符合大会第37/30号决议的解决办法扫清道路的重要性。

但是,人们不应该忘记根本的问题是对该领土的占领以及使该领土非殖民化的迫切需要。我们感到关切的是,秘书长所开始的会议可能会变成一种常例。

我们建议本委员会对毛比拉抵抗力量全国委员会所提议的决议草案给予适当重视。这一决议草案是合理的,并呼吁秘书长、葡萄牙和印度尼西亚举行会谈以建立停火、减少军事人员释放政治犯和举行人口普查。过渡阶段将以国际监督的公民投票结束。

最后,所制定的任何计划务必承认入侵的非法性,并实施所有必要措施以实现非殖民化。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建议,就短期而言,专门机构加强其存在并继续在秘书长主持下的谈判,并且建议敦促印度尼西亚释放所有政治犯,并开始在该领土撤出其武装部队。

我们呼吁第一世界的各国人民重新考虑。没有人能自称是人权的卫士,同时却让经济利益高居正义和各国人民基本权利。

请愿者退席。

应主席邀请,阿兰·韦尔先生(东帝汶独立委员会)在请愿者席位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韦尔先生发言。

韦尔先生(东帝汶独立委员会)(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有机会介绍新西兰欧提罗阿奥克兰东帝汶独立委员会的声明,其中包括附加的塔尔·埃纳雷先生的意见,埃纳雷先生是新西兰欧提雷罗议会的一名土著议员,新西兰第一党的副领袖。埃纳雷先生曾于1994年访问东帝汶。由于时间的限制,我不能全文宣读这些意见,但是将会提供这些意见的书面稿。

新西兰欧提罗阿奥克兰东帝汶独立委员会是一个关心和支东帝汶人民自决权利的人士组成的组织。自从印度尼西亚1975年入侵东帝汶以来,新西兰国内一直有支持东帝汶人民的积极呼声。本组织和我们的姐妹团体,如惠灵顿的东帝汶独立中心的活动以唤起公众对东帝汶人民局势的认识和游说我国政府采取更加有利的立场支持东帝汶人民为中心内容。

自从1991年和围绕着帝力大屠杀事件的报道宣传以来,新西兰人已变得非常关心东帝汶的人权局势。在帝力大屠杀中,有1个新西兰年轻人卡迈勒·巴马扎夫丧生。1994年5月,来自所有政党的51名新西兰议会议员——这占议会议员的多数——签署了一份给印度尼西亚驻新西兰大使的请愿书。请愿书要求印度尼西亚解决东帝汶境内践踏人权的问题,并对东帝汶人民的自决权利表示支持。此后,一个由5人组成的议会代表团访问了东帝汶,并随后对东帝汶境内侵犯人权的情况和军事化的程度,表示共同关切。

1995年12月,NBR顾问公司所作的一次民意测验的结果被广泛报道。这些结果表明,被提问者中只有9%赞同政府官方的意见,即对东帝汶的占领是不可逆转的。根据这次民意测验,49%的新西兰人认为,新西兰应该推动东帝汶人的独立事业,33%的人对这一问题没有看法。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尽管全国对改变我国政府对东帝汶政策的支持日益壮大,但是迄今为止,这一改变仅限于表达对人权问题的关注和支持联合国促进葡萄牙政府和印度尼西亚政府间正在进行的会谈。目前新西兰国内对计划于今年8月举行的一次印度尼西亚和新西兰间联合空军演习有相当大的反对意见。本组织正在把要求我国政

府退出这次演习和要求结束印度尼西亚同新西兰之间的一切军事联系挂钩。

我们非常感兴趣地注意最近由联合国主持,在奥地利举行的帝汶人之间的会谈。我们欢迎《伯格施莱宁宣言》,特别是肯定葡萄牙政府和印度尼西亚政府在秘书长主持下正在进行的谈判,“以期按照大会第37/30号决议的条款、文字与精神,找到一个公正、全面和国际可接受的解决东帝汶问题的办法。(A/AC.109/2026,第40段)

我们敦促特别委员会特别仔细地注意大赦国际和其他人权团体以及流亡国外的东帝汶人提交委员会的材料,这些材料详细记载了东帝汶境内仍在践踏人权的状况,酷刑、非自愿失踪、虐待政治犯和在法律程序以外的谋杀印度尼西亚军方最近在利基萨杀害6名平民,仅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我希望通过强烈的行动决议,支持东帝汶人民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的神圣权利。我们现在概要介绍新西兰第一党副领袖和访问东帝汶代表团成员塔尔·埃纳雷的意见。

独立和自决是一切土著民族理想。东帝汶人的本土灵魂已经并将继续被来自外部的不断打击所削弱。他们的语言、信仰或宗教、历史和社会结构因印度尼西亚军队的驻扎和印度尼西亚的统治而受到破坏。新闻审查,有时是自己强加的新闻审查,继续使东帝汶人保持沉默。

对于殖民化最好的描述是一个团体竭力夺取另一个团体的经济基础的过程。东帝汶人在就业、经济和自身文化方面受到剥夺。这与新西兰欧提罗阿的土著居民毛利人在本世纪开始前后的经历是相同的:人口不断下降,殖民势力不断上升。

经过350年的葡萄牙统治和20年的印度尼西亚统治之后,东帝汶人民争取恢复他们自己的国家地位的努力应该得到国际援助。一项最终导致自治的十年非殖化方案,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不会在短期内造成太大的混乱。非殖化涉及重新考虑各种政治、法律、经济和社会机构。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具备的六大基石包括语言、法律、价值观念、教育、卫生和经济基础,即土地。因此,自决必须

具体表现为拥有资源,有一个活的文化和活的语言。如果现在就采取这适当行动,东帝汶的本土文化是可以恢复的。

罗杰·麦克莱曾建议,可以作出一种同新西兰已与库在群岛所作的一样的安排。库克群岛的居民拥有新西兰公民身份,有权利享用新西兰的教育和经济福利。在帝汶问题上,这种安排值得考虑,但决定权在于帝汶人。

新西兰应该促进非殖化进程。东帝汶人和印度尼西亚人之间的直接会谈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印度尼西亚的恫吓策略绝不能再被接受。新西兰只有承诺批评其他国家的人权记录,才能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一个道义的立场。印度尼西亚政府了解新西兰对待毛利人的历史。如果我们不在自己的国家内致力于纠正进程,我们在道义上采取高姿态是自相矛盾的。毛利人、澳大利亚土著人、夏威夷人和大溪地人的困境值得考虑。太平洋地区居住着许许多多的土著民族。何时才能让他们作为自治、自决的人民生活?

为什么新西兰一直对帝汶采取冷漠的立场?政府的政策中始终充满有选择性的道义。现在是该国表明立场的时候了。在任何国家侵犯人权都是不能接受的,包括在欧体罗阿。

请愿者退席。

应主席邀请,托马斯·马埃迪先生(国际天主教和平运动)在请愿者席位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马埃迪先生发言。

马埃迪先生(国际天主教和平运动)(以英语发言):国际天主教和平运动感谢特别委员会主席和成员们给我们这次机会就东帝汶问题发言。国际天主教和平运动赞扬委员会同各感兴趣方面共同努力,执行委员会各项使命的努力。

今年是国际基督和平成立五十周年。国际基督和平在最近的一次庆祝活动上表明,东帝汶人民的人权及自决权利仍然是高度优先考虑的事项。

《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大会1960年12月14日的第1514(XV)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第384(1975)和389(1976)号决议,为争取东帝汶人民的人权、尤其是自决权利提供了基础。

国际基督和平支持联合国的各项努力,包括利用秘书长的斡旋,来实现东帝汶及其自决问题的公正、全面和国际上接受的解决方案。联合国调查报告和建议可帮助提供防止侵犯东帝汶人民人权的情况并调查这类情况的机制。然而,这些国际标准要有效力,就必须得到执行。

联合国司法外、即决或任意处决情况特别报告员在1994年7月访问东帝汶后报告说:

“使圣克鲁斯屠杀事件发生的条件仍然存在,特别是对虐待情况负有责任的保安部队成员仍未得到追究,而且实际上继续不受惩罚。”(E/CN.4/1995/61/Add.1,第74段)

特别报告员坚信,在就屠杀事件申张正义之前,任何建立信任措施都不会有效,而且不会找到解决东帝汶面临问题的任何办法。

特别报告员的报告的12项详细的建议认为,印度尼西亚政府应采取下列具体步骤:邀请关于强迫或非自愿失踪事件的工作小组在东帝汶执行任务;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公约》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执行特别报告员关于1991年11月之行的报告中的建议;大幅度削减其东帝汶的军事存在;以及鼓励国际和独立非政府组织。

象大赦国际这样的非政府组织提供了目前关于印度尼西亚在1994年和1995年持续和越来越多地侵犯东帝汶人民人权情况的文献资料。在东帝汶内部,罗马天主教会的领袖继续表示反对屠杀、酷刑和任意逮捕。帝力主教赞成就自决举行公民投票,并表示愿促成为一系列联合国监督下的各方之间对话。

去年在东帝汶和印度尼西亚发生的事件使世界注意到东帝汶人的困境。虽然正就一项解决东帝汶问题的长期办法进行辩论,各种主动行动能够而且必须继续为处理这些问题的机制提供基础。这种主动行动可以而且必须包括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履行其作出的承诺;接触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工作小组和各专门机构;各国际和人权团体更自由地进入东帝汶;同各国政府、非政府和政府间组织进行对话;减少军事人员;以及执行各项国际人权文书。联合国发起的对话应继续,然而任何认真的建议应当而且必须使帝汶人民参与谈判。

最后,让我们在公开和勇敢的对话中一道努力,以建立各种机制来尊重东帝汶人民的宗教和文化传统,保护其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利、特别是其自决权利。

请愿者退席。

下午6时10分散会。